

如果要评选中国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司马光，当然是因为他的伟大著作《资治通鉴》。在他以前，虽然主要史书有纪传、编年两体，但纪传体的体例是本纪略具提纲，列传专记个人，至于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，则非反复研读史书，无法理清头绪。编年虽历代皆有其书，或过于简略，或仅及一代。唐初兴起编年体的实录，继任皇帝要为先帝一朝修实录，很好的创意，但本朝修本朝事，要求真相，那就难了。

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际，硬是坚持工作十九年，将公元前403年到后959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在占有全部文献的基础上，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，用通晓畅达的语言表达清楚，台面上的理由是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鉴，主要目的还是将这些年代重大史书全部梳理清楚。南宋后讲史艺人都以此书为工作底本，更发挥了向民众普及的价值。

司马光如何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？可以举出个人学养、皇帝支持、助手得力、史观通达、亲力亲为、坚持始终等原因。其他人也有机会得到这些条件，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成功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以司马光为中心的团队的通力合作，加上司马光始终亲自执笔，方得成功。

司马光修《通鉴》，最直接动机是他编年叙述先秦时期的史书《稽古录》得到英宗赞许，且要求他扩展至有宋立国以前。继位的神宗继续支持，恰好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，于是退居洛阳，专事著述。皇帝倒也理解，让他史局自随，提供经费，配备助手。所谓助手，就是名份仍是朝廷官员，职守仅是编书。司马光挑了刘放、范祖禹、刘恕三位，学问好，史有专攻，乐于协作，政见也接近，不然常起争执也不好。

这三位助手可以略作介绍。刘放(1023—1089)，字贡父，仅比司马光小四岁，但成名甚早，

濠上漫与

司马光的团队

■陈尚君



上图为司马光画像与《资治通鉴》。左图为《资治通鉴》残稿(局部，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)。

是北宋最著名的汉史学者，宋时《汉书》经他校刊方通行，著作亦多。《通鉴》开修，他以知曹州人为国史院编修官。因汉史有《汉纪》《后汉纪》两部编年史可为基础，《通鉴》汉代部分成书较早，因而他离开团队的时间也较早。

范祖禹(1041—1098)，字梦得，三人中年龄最小。他双亲早亡，由叔祖范镇抚养成人。司马光与范镇为莫逆友，故选定他。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，司马光指点他仕进不可有贪心，得以尽改旧习，专力修书十五年。其中最繁芜的唐代部分，由他专主其事。他后来奏进自己的著作《唐鉴》时，自述“臣昔在先朝，承乏书局，典司载籍，实董有唐。尝于细次之余，稽其成败之迹，析以义理，辑成一书。”南宋高宗通读两书，认为“读《资治通鉴》，知司马光有宰相度

量；读《唐鉴》，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”(《贵耳集》卷上)，即看到两者的联系与不同器局。

刘恕(1032—1078)，字道原，是司马光主贡举时的门生。他一生精力几乎尽瘁于《通鉴》，在书成前六年就因风挛疾去世。长编部分，他承担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部分，司马光视他为左右手。他本人从政经历几无可述，本人著作最重要的是《十国纪年》四十二卷，可惜没有传世。《通鉴》的十国部分以此书删削而成，史料价值最高。

三位助手都是饱学之士，且都进士登第，愿意不计较自己的仕宦前程，给司马光当下手，当然是出自对司马光道德人品、学问识断的景仰与信任。而全书编纂得以顺利展开，更得益于司马光的规划得当，掌控有方。

今存司马光《与范内翰论修书帖》，就是具体指导范祖禹如何编纂唐史长编，即以实录为基础，实录中事有涉及前后者，加注于前后事项下，然后要求“将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纪志传及《统纪》《补录》并诸家传记小说，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，皆须依年月日添附，无日者，附于其月之下，称是月；无月者，附于其年之下，称是岁；无年者，附于其事之首尾。”即把当时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与史实有关的记载，分年、月、日加以编排，使无遗漏。然后再说明“有无事可附者，则约其时之早晚，附于一年之下”，并告知唐代文献中有涉及隋前、唐后者，亦摘出交另人。还有许多细节的交待，比如一年几次改元，以何年号为准；但凡仅属文辞优雅的文章，书写自己心情的诗歌，或“诏诰等若止为除

官，及妖异止于怪诞，诙谐止于取笑之类”，则一概不取，但如果其间“或诗赋有所讥讽”、“诏诰有所戒谕”、“妖异有所儆戒”、“诙谐有所补益”，仍请保留。细节交待如次清楚，保证团队工作之有序进行。

浩翰大书，又遵循上述步骤操作，工作量是巨大的，据说留在洛阳的修书的残稿就装满两间屋子。更可贵的是，司马光始终坚持亲自定稿，严格为自己制定额定工作量，将范祖禹汇录的《唐纪》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，规定自己每三天删订一卷，如果某天有事耽误了，后来一定要补上。他身边常常仅一老仆伺候差遣，夜里让老仆先睡，自己看书直至夜半方睡下。五更初即起来，点灯著述，夜夜如此。为防读书时睡着，他把一节圆木做枕头，称为警枕，若困倦睡下，枕头滚动，人即惊醒。

宋元时不少人见过司马光修书草稿，无一作草字，一丝不苟。文物出版社1961年曾影印司马光手稿一份，记东晋元帝永昌元年(322)史事大要，共二十九行，四百六十余字，通篇正楷，字体规范。对此稿性质，学界有不同看法，或以为《通鉴》初稿，或以为删改长编供书吏誊写的提示，等等。多年持续工作，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。他在《进《资治通鉴》表》中说：“重念臣违离阙庭，十有五年，虽身处于外，区区之心，朝夕寤寐，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。顾以驽蹇，无施而可，是以专事铅槧，用酬大恩，庶竭涓尘，少裨海岳。臣今筋骸羸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。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”这一年是元丰七年，他六十五岁，离开朝廷已有十五年，皇帝很少催促，但他始终朝夕抓紧，终克有成。书成之时，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，后两年即去世，真是“精力尽于此书”。

今人作科研，喜讲团队合作。以司马光为例，倘无三位助手的倾力合作，没有团队核心司马光的亲自定稿、全力投入，这部伟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难想象的。

鲁迅先生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杂文、小说、散文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然而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鲁迅先生平时还十分爱写打油诗。

鲁迅曾多次自称“不懂诗”，是“外行”。他说：“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——但也不喜欢做古诗——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，所以打打边鼓，凑些热闹，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，就洗手不作了。”即使这是自谦之词，仍然捎带着把那些无病呻吟、自命不凡的所谓“诗人”调侃了一把。事实上，鲁迅以打油诗这种信手拈来的体裁，妙趣横生却又入木三分地讽刺、批判了种种社会丑恶现象，可以说，在鲁迅笔下，打油诗依然是“投枪”和“匕首”。

清朝末年，日本东京有一所中国留学生学习陆军的预备学校，名叫成城学校，其学生多为清廷选派的皇亲国戚，其中不少纨绔子弟，每日花天酒地，不求进取，只等混满时日，回国投机钻营捞个军官职位。这些保皇派，还装出“大将军”派头，嘲笑“自由平等”，向要求革命的留学生示威。1903年，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，看到这些情况心中极为愤慨，于是写了多首打油诗讽刺、批评这些有负于国家

的留学生。其中有一首为宝塔诗：
兵
城
大将军
威风凛凛
处处有精神
挺胸肚步行
说什么自由平等
哨官营官是我本分

这首打油诗排列似塔，韵脚工整，入木三分，刻画出了保皇派留学生可憎的嘴脸。三国时期曹植写过著名的《七步诗》：“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”1924年，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荫榆依附北洋军阀政府，对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。鲁迅怒火中烧，于是仿照《七步诗》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煮豆燃豆其，其在釜下泣。我炖你熟了，正好办教席。”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杨荫榆

鲁迅偏爱打油诗

■刘凯

等人镇压学生运动，牺牲青年学生的鲜血来举办“吃人筵席”的无耻作法，读来令人义愤填膺，产生了极强的讽刺效果，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“地震”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鲁迅先生目睹南京国民党各路“专员”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现状后，愤然写了一首《南京民谣》：“大家去谒陵，强盗装正经；静默十分钟，各自猜拳经。”用俏皮、诙谐的语言，对那些“大人物”的伪君子形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！

1933年初，日军侵占热河省，逼近京津，华北危急。国难当头，北平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镜头：一方面是达官贵人仓皇出逃；一方面是北平的大学生集体请愿，为民族存亡而奔走呼号。鲁迅目睹此状，仿照唐诗《黄鹤楼》写了一首打油诗：

阔人已骑文化去，此地空余文化城。
文化一去不复返，古城千载冷清清。

专车队队门前站，晦气重重大学生。
日薄榆关何处抗，烟花场上没人惊。
全诗对“不抵抗派”置民族危亡而不顾，依旧在“烟花场上”醉生梦死的做法，进行了痛入骨髓的批判、嘲讽；以怜惜的口吻对大学生的报国行为进行了“点赞”。此诗不啻一记重拳，打疼了一批，打醒了一批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鲁迅还写过两首善意批评好友的打油诗。

北大教授钱玄同曾著文提出，人超过四十岁就应该死掉，从而实现社会年轻化。他还扬言，北大若开设辩证法课程，除非砍掉他的脑袋。鲁迅认为钱玄同的想法既偏激又保守，写了首打油诗委婉地批评钱玄同：“作法不自毙，悠然过四十，何妨以肥头，抵当辩证法。”

著名编辑赵景琛是鲁迅的好友，也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，但其译文时有错误，如将“银河”译成“牛奶路”，将“半人半马怪”译作“半人半牛怪”。鲁迅批评他治学不严谨，有误人子弟之嫌，便作打油诗加以批评、规劝：“可怜织女星，化作牛郎归，鸟鹊疑不来，逗逗牛奶路。”让人发笑之余，也可窥见鲁迅治学严谨之一斑。